

周恩来对卓别林体察入微赠送美味香酥鸭

在景色秀丽的日内瓦莱蒙湖畔,坐落着一幢白色的老式三层建筑物,名叫花山别墅。1954年夏,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举世闻名的日内瓦会议,曾下榻于此。当时就在这所普通的房子里,周总理与世界影坛巨星查理·卓别林有过一次亲切而愉快的会见。

周恩来发出邀请

早在上世纪初卓别林的喜剧短片刚刚传入中国时,周恩来就曾观赏过,对这位具有卓越才能的电影艺术大师的印象十分深刻。在这次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总理有机会又一次看到卓别林自编、自导、自演的优秀故事片《城市之光》,对这位天才电影艺术家娴熟而巧妙地深将悲欢与幽默笑料融为一体之精湛技能更为叹服。当他得知卓别林因从事进步电影文化受到美国反动势力迫害,不得不满怀愤慨举家离开生活近四十年的美国,卜居于瑞士韦威镇的一个僻静小村庄后,特意邀请卓别林及其一家前来作客。

卓别林接到中国代表团转达的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电话后,既兴奋,又感不安。尽管他对中国并不陌生,30年代初赴东方旅行时曾乘船途经上海作短暂停留,与梅兰芳等中国艺术家还有过交往,但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像周恩来这样的高级党政领导人,还从来没有过任何接触,因而怀有一种敬畏心理。然而,令卓别林意外的是当他与家人如约来到花山别墅时,周恩来已笑容满面地站在寓所的台阶上迎接。



“啊,四十年前,就在银幕上认识您了!”周恩来总理紧握着卓别林的手,热情洋溢地称赞他的艺术才能,尤其提到刚刚看过的《城市之光》这部抨击资本主义弊端的影片。这番话语对正遭受政治迫害的卓别林听来,非同一般见面伊始的“寒暄”。此时美国当局已宣布禁映其影片,并不准其再入境,而来自中国正成为日内瓦会议风云人物的周恩来总理,却以如此亲切的口吻表示尊敬和

赞扬,卓别林感到一股暖流涌入心际。原先觉得自己与周恩来之间存在的某种障碍,顷刻间烟消云散。当他随同周恩来走进客厅落座后,立即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

向卓别林介绍长征

卓别林首先关切地询问正在举行的日内瓦会议。当周恩来坦率地平静地告诉卓别林“一切都和平解决了”时,这位曾以电影艺术为武器同法西斯主义作坚决斗争的国际和平战士,会心而欣慰地笑了起来,连声称赞周恩来“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为日内瓦会议作出了积极贡献。”对周总理卓越的政治家风度和杰出的外交家才干深表钦佩。

随后,周恩来又应卓别林的要求,介绍了中国革命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在此以前,卓别林就听说过许多这方面的传闻,30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濒临绝境,到在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领导和组织下突破重围,重振军威,仍觉得像是难以置信的奇迹。当他看到曾与毛泽东一同参加那一次横贯中国的著名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的周恩来,此刻就端坐在自己的对面,显得是那么沉着和年轻。他在惊奇之中终于信服了。卓别林以惯有的幽默口吻开玩笑说:“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周恩来听了爽朗地仰首大笑。

卓别林还回忆起1936年途经上海时所见到的中国人民在铁蹄蹂躏下的悲惨生活情景,感叹地说中国真的变了,恳切地表示希望有机会再去

看看新中国。周总理当即热情地邀请他访问中国,卓别林欣然接受。

体察入微打包香酥鸭

会见快中午,周恩来请卓别林及家人共进午餐。席间宾主频频举杯,互致良好祝愿。面对满桌佳酿美肴,卓别林赞誉不绝。他指着面前的茅台酒夸奖道:“这种中国香橙才是真正男子喝的酒!”又试探地询问能否允许带上一瓶回去作纪念?周恩来总理当即答应送他两瓶。

当香酥鸭端上来时,卓别林乐不可支。他饶有兴趣地讲起自己曾到许多国家,无论走到哪里,那儿的人们就学他鸭子步来表示欢迎。说着,卓别林站起来表演了几段鸭子步,顿时,席间响起了欢乐的笑声。

餐后,卓别林犹犹未尽。他说:“今天吃得满意,谈得高兴,是非常愉快的一天。”接着,又以颇为遗憾和惋惜的口吻讲:“美中不足的是,我还有一个孩子没有来,未能尝到中国的美味佳肴。”他说得无心,周恩来总理听了却随即吩咐工作人员将另一只做好备用的香酥鸭和烧饼包上,让卓别林家人带回去给没有来的孩子尝一尝。此情此景令卓别林异常激动和惊讶。

与周恩来是初次见面,一个泱泱大国的领导人,却能给予身处逆境的自己如此真挚细致的关怀,实在没有想到,不禁久久地注视着周恩来。为了感谢所受到的盛情款待,卓别林特意提出将其所主演的影片《舞台生涯》赠送给周恩来。

长达7个小时的愉快会见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又和卓别林及其家人合影留念。握手告别时,卓别林一再激动地说:“今天是我毕生难忘的一天!” (据《内蒙古党史》)

原子弹计划是如何制订的

刘杰曾任地质部副部长、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寻找原子弹材料、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指挥者之一。他曾讲述制订原子弹计划的往事,诸多细节鲜为人知——

下定决心要搞原子弹

1952年夏天,中国开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已经提到要不要搞原子弹及核武器的事了。周总理的军事秘书要制订计划,就去中科院找竺可桢。竺可桢说,这个东西要有人,要有钱,得花很多的钱,我们现在搞不起。要搞,最好请苏联专家帮助。

那时我在地质部担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发现苏联专家中有一位是搞铀矿的,就向他请教如何找铀。1954年,地质队在广西发现铀矿,他们把标本带到北京。第二天,我和几位地质学家带着铀矿石标本到毛主席那里,主席很高兴,说:我们相信中国有很多铀矿。我们也要发展原子能。1954年国庆,毛主席邀请赫鲁晓夫来北京观礼。会谈时,请对方在原子能核武器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说: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还有困难吧。那个东西太贵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个核保护就行了,不要大家都搞。我想,赫鲁晓夫要把中国放在他们的核保护伞下的说法,使毛主席下定决心要搞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被列入中央的议事日程是1962年。这里有两个历史背景,一是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后,美国国会正式授权可以对华使用核武器。1958年,炮打金门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另一件

1944年初,苏联红军在东北高歌猛进,纳粹德国军队的战线逐渐动摇。为了扭转战场上的颓势,接替海德里希出任德国盖世太保头目的恩斯特·卡尔滕布鲁纳提出了刺杀斯大林的计划,即“齐柏林行动”。按照行动要求,德国空军第200特种轰炸机联队将出动一架运输机,把一名刺客运送到莫斯科附近的秘密降落点。随后,刺客换乘摩托车进入莫斯科,伺机刺杀斯大林。

起初,被选定执行刺杀计划的是一名被俘变节的苏联男性战俘,后来刺杀小组又加入一名女战俘,两人甚至在行动开始前结为夫妇。“齐柏林行动”于1944年8月底正式启动,盖世太保先向预定的降落点派出一名间谍侦察情况,9月4日,该名间谍发回一个简短的电码:“行动!”早已准备就绪的刺客夫妇旋即于当夜登上一架Ar-232运输机,从拉脱维亚某机场起飞,直奔离莫斯科60英里远的降落点。

运输机一路上都平安无事,但在接近降落点时却突然遭到苏军高射炮的猛烈射击。原来,盖世太保派出的侦察间谍早就被苏联情报部门抓获,“行动!”的电文是在苏联红军

事是1960年苏联召回在中国的专家,把关键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这时又恰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中央毅然决策,自力更生研制核武器。

立军令状两年爆破原子弹

1962年,在南昌上空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飞机,外交部为此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英国记者提问:中国将在1964年爆炸原子弹,此事是怎样的情况?陈毅副总理没有正面回答。之后,陈老总就去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把我也叫去了。周总理给我看了一份内部参考,说:“刘杰同志,美国记者推测说,我们1964年将爆炸原子弹,这篇文章在西方引起很大反响,你说说,我们能实现吗?”我没有思想准备,不知如何回答。陈老总拍了桌子,我只好说:“总理陈老总,这样行不行,我回去后写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明确回答。”

我们先把核武器研究院的李觉和朱光亚找来,把总理及陈老总的的话同他们说了。朱光亚认为:原子弹理论已经突破,应该能按时完成。李觉的意见是:原子弹计划出来,需要进行大型炮轰实验,这个实验只有在青海才能完成,现在青海的工程只进行到一半,我们将尽快完工。

1962年9月11日,我们向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的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报告送上去不久,聂帅在国防科委召集罗瑞卿、张爱萍、刘西尧、钱三强、李觉、朱光亚和我开会,研究我们制订的计划。

真假公里以及若干空白证明文件,理论上可以混进克里姆林宫,实施刺杀计划。接近莫斯科时,两人被一个检查站拦住。“塔弗林少校”向哨兵出示证件,没有引起怀疑。正当哨兵准备放行时,“少校”心血来

潮地抱怨了一句“骑了一整夜摩托车,太辛苦”这句话让正在抬拦阻杆的哨兵停下动作——不久前(指Ar-232迫降前)刚下过雨,眼前这位“少校”和“少尉”还有摩托车怎么一点都没湿呢?

想到这里,哨兵立即敲响警报,两名刺客被苏联士兵扣下。至此,所有参与“齐柏林行动”的人员,包括前期侦察的间谍、两名刺客以及负责运送的飞机机组全被苏军抓获,盖世太保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结局。(据《新民晚报》)

我表态说:“两年规划是我给中央立的军令状,实现不了,我上军事法庭。”聂帅说:这个军令状是你刘杰立的,也是我聂荣臻立的,我陪你上军事法庭。

周总理守在电话机旁

1964年9月23日,周总理在西花厅召开特密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贺龙、陈毅、张爱萍、刘西尧和我。确定原子弹爆炸时间应在10月下半月或11月上旬,最好选在10月15日到10月20日之间。爆炸日期确定之后,张爱萍在第一线指挥,刘西尧协助。我留在北京协助周总理处理一些事情。10月15日,核试验基地传来保密电话,根据气象情况,零时定为16日,零时定为15时。

在爆炸前的一刹那,还有人问我:“究竟怎样?”我说:“可能有万分一的问题。”周总理守在电话机旁。章汉周在听电话:“响了!”周总理立刻接电话:“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说:“看到了烟云,的确是核爆炸。”周总理马上报告毛主席,毛主席说:“是不是真的核爆,要弄清楚。”张爱萍在那边做了进一步肯定回答。毛主席说:“再检……先不要对外公布,等外电报道证实后,我们再报道。”

日本、印度、苏联都侦察到我们的原子弹爆炸。10月18日,赫鲁晓夫下台。这时我才明白,总理为什么要原子弹在10月20日之前爆炸,中央已经预计到赫鲁晓夫下台。(摘自《老年文摘》)

而且玩得超过同学好多。爸妈刚知道我玩游戏的时候,爸爸打了我,妈妈也哭着劝过我。后来,爸爸可能看到他的打骂

刺杀斯大林的阴谋因下雨败露

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是一位去地里干活的大爷,想坐在水泥管子上歇歇时,发现了我。听说当时大爷吓坏了,他以为我是一个死后被人扔到这里的鬼孩子。

在派出所里,头发蓬乱,睡衣都没来得及换下来的妈妈,见到我,一步跑过来,紧紧抱着我,哭得几乎晕过去。妈妈的双臂紧紧地搂着我,边哭边说:“诺诺,要真找不到你了,妈妈还活个啥呀?”

在妈妈的怀抱里,我也哭了。爸爸铁青着脸,没有跟我说话,也没打我。走出派出所,他才狠狠地骂道:“丢人现眼的东西!给老子丢人都丢到公安局来了。”爸爸把手上的烟屁股重重摔到地上,然后又说:“往后,你爱咋咋吧,反正我是管不了你了。你长大了,不走正道,别怪我没管你!”

我没说话,心里却恨恨地想,你凭啥管我?你有什么资格管我?连你自己都不管我,还想管我?哼!不管我正好,你以为我愿意让你管我!除去会打人,你还会啥?那时,心里对爸爸充满了怨恨。

而且玩得超过同学好多。爸妈刚知道我玩游戏的时候,爸爸打了我,妈妈也哭着劝过我。后来,爸爸可能看到他的打骂

升人初中后,我对电视已没什么兴趣。放了

用真实事件解读孩子成长问题 20个故事,还原懵懂少年的迷茫与彷徨。温情絮语,指引他们与青春和解。勇敢告别青涩岁月的荒诞与不羁,看得见远方,就不惧未来,不畏成长。

学,我喜欢到游戏厅去玩游戏。我学习一直不好,可对游戏,我像是有这方面的天赋,一看就会了,对我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也就懒得再管我了。初三那年,我跟爸爸进入冷战状态,我们俩

此谁也不理谁,谁也不跟谁说话。有什么事,我只跟妈妈说。

只要我放学不按时回家,妈妈就挨个游戏厅去找我。为了怕妈妈找到我,我就跟同学去县城边上的游戏厅玩。开始妈妈只是在离家和学校比较近的游戏厅找,后来,妈妈骑着自行车,一家家挨着找,最后还是找到了我。妈妈这么不停地找我,让我很烦。有一次我又到城边上的游戏厅去玩,妈妈找到我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当时我正玩得起劲,妈妈进来了,她拉着我的胳膊,劝我回家。我猛地一甩手,把妈妈甩了个趔趄。妈妈哭着说:“诺诺,不能再玩了。”妈妈知道管不了我玩游戏,她叫我回家,是怕我在外边待的时间长了,跟别人学坏了,干出别的事来。看到妈妈当着同学的面哭,我觉得很没面子,心里更烦了。在妈妈又一次过来拉我的时候,我恶狠狠地对妈妈说:“你管不了我爸爸,就来管我。有本事你让我爸爸整夜在外边打扑克呀!”妈妈拉着我袖子的手慢慢松开了。我继续玩游戏,我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时候走的。

妈妈受伤的那段时间,我没有再去游戏厅。(十二)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

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本文说的就是东三省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几个故事……

两次哈尔滨保卫战

1932年1月,各路义勇军齐聚哈尔滨,打响了哈尔滨保卫战。1月27日天刚放亮,伪军就在日军重炮的掩护下向市郊发起攻击。义勇军官兵海部凭借壕沟,攻地进行了猛烈还击。伪军丢下越来越多的尸体,却没有前进一寸,惹得督战的日军痛骂不止。战斗持续到下午,日军的4架“零式”战斗机前来助战,在我军阵地狂轰滥炸。义勇军战士们用步枪击伤一架敌机,日军乘员清水清大尉被击毙。与此同时,义勇军李社部、冯占海部在上号、南岗一带与伪军交战,敌人尸横遍野,一个团的伪军在战场倒戈。到28日,敌人全线向南溃退,第一次哈尔滨保卫战取得了胜利。

2月3日,日军主力部队抵达哈郊,以坦克和装甲车开路,向市区发动进攻,第二次哈尔滨保卫战拉开序幕。义勇军利用民房、巷子和日军对垒,展开肉搏战。至5日凌晨,义勇军由于连日苦战,损失严重,只好撤出战斗。

“老三营”勇夺敦化

1932年2月8日,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营长王德林率部起义,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因此他的部队编号“老三营”。这一年元宵夜,救国军悄悄潜至敦化城外。天刚放亮,攻城战斗在炮声中打响了。副连长史忠率率领战士们搭起云梯,第一个跳上城墙,冲入敌阵,战士们紧随其后,守在城墙上的日伪军还没有从慌乱中醒过

神来,就上了西天。

守在南门的伪军本来就对日本侵略者怀有莫大的仇恨,见部队来攻城,立即调转枪口,把9名日军捆了个结实,并打开城门,一起投入了攻城战斗。城内民众闻听救国军来了,都行动起来进行策应,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彻底溃败,日军守备队长谷以下50多人当场毙命。

“老北风”三战海城

辽南一带,有一股抗日的痞子,当家的名叫张海天,江湖报号“老北风”,后来成为义勇军第二路司令。

1932年3月17日,“老北风”指挥近万名义勇军,铺天盖地涌向海城及附近的乡镇,龟缩在各个据点的日伪军纷纷四散逃命,城内大批军事设施被捣毁,敌人死的死,伤的伤。

8月初,张海天再度攻击海城,他选准了日军的一个兵站作为主要目标,“敢死队员”割断电网,一把火点燃了军需仓库旁的草垛,火势迅速蔓延,整个兵站成了一片火海。一天夜里,海城郊区响起了“枪声”,日伪军以为是义勇军攻了上来,便开炮放枪乱打一通。打了半夜才闹明白,原来是当地的农民得了病,放鞭炮治病消灾。日伪军恼羞成怒,用炮火报复,把整个村子夷为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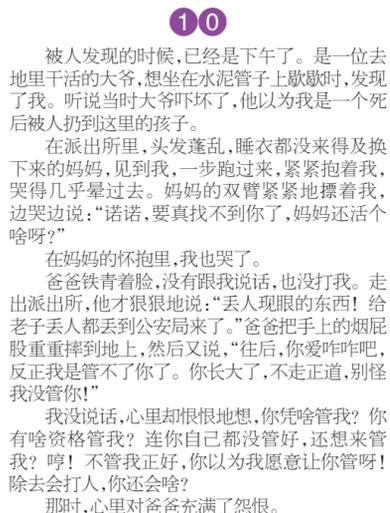
“老北风”得到消息,决心叫侵略者血债血偿。这一夜,“老北风”率部第三次袭击海城,分割包围了火车站,敌人死伤过半,建筑物被彻底焚毁。

王凤阁慷慨就义

1932年4月,王凤阁在通化、临江交界处,组成了以伐木工人为主体的,以中小学教师为骨干的“辽东民众义勇军”,坚持游击战争长达5年之久。

1935年,日军逮捕了王凤阁的岳母及亲属多人,并逼迫她们写了劝降信。王凤阁当众宣布:“日军即使将我老母、妻子抓去,也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任何亲友,同情我抗日者亲之,给日寇当汉奸者杀之。”

1937年3月,王凤阁及妻儿在突围中被俘,被押到通化。日军在城里东江春饭店摆了一桌酒席,为王凤阁“接风”,王凤阁直接把酒席掀翻在地。4月1日,是行刑的日子,闻讯赶来的群众站在远处为他送行。临刑前,王凤阁将军高喊:“老乡乡亲们,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其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就不会亡……”将军就义时,年仅42岁,他的妻儿及5名战士同时遇难。(摘自《人民政协报》)



连载

圆桌对面的孩子

鞠慧